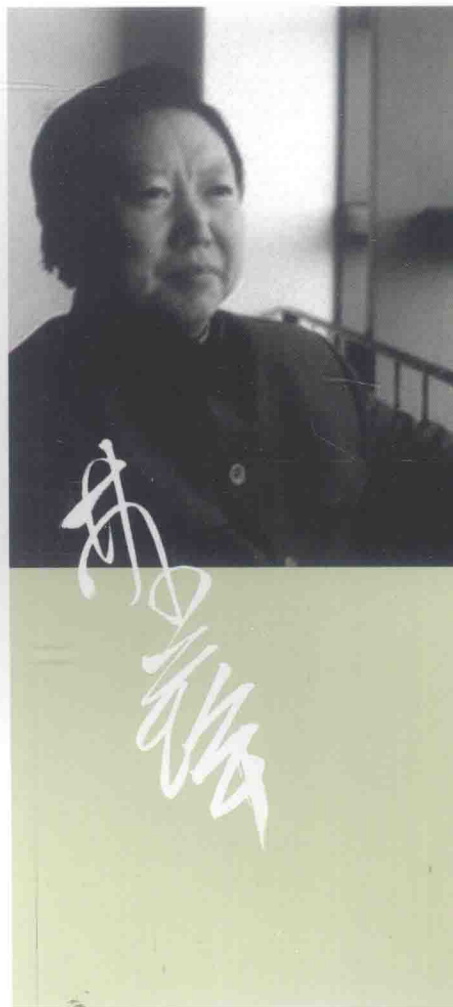


中国传统翻译理论观照下的

林少华文学翻译研究



柯子刊◎著

南开大学出版社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HUST: (2014QNRC006)

中国传统翻译理论观照下的 林少华文学翻译研究

柯子刊 著

南开大学出版社

天 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传统翻译理论观照下的林少华文学翻译研究 / 柯子
刊著. — 天津 :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15.4

ISBN 978-7-310-04771-0

I. ①中… II. ①柯… III. ①林少华—文学翻译—研
究 IV. ①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54147 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孙克强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 邮政编码:300071

营销部电话:(022)23508339 23500755

营销部传真:(022)23508542 邮购部电话:(022)23502200

*

唐山新苑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5 年 4 月第 1 版 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230×155 毫米 16 开本 23.25 印张 2 插页 344 千字

定价:46.00 元

如遇图书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调换,电话:(022)23507125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节 继承中国传统翻译理论	1
第二节 林少华文学翻译研究价值	11
第三节 将林译置于中国传统译论观照下进行研究的理由	14
第四节 研究方法	18
第一章 中国传统翻译理论	21
第一节 中国传统译论的界定	21
第二节 中国传统译论的文化基础	27
第三节 中国传统译论的核心内容	35
第二章 林少华的身份认定	68
第一节 林少华翻译观	69
第二节 林少华文学观	81
第三节 双重身份间的互动	93
第三章 诚于译事	103
第一节 林少华的学识构成	104
第二节 翻译对象的选择	110
第三节 译本的锤炼	116
第四节 多方认可	124
第四章 案本求信 以象达意	130
第一节 书名翻译	131
第二节 译文翻译	138
第五章 译以致用 以文行远	161
第一节 翻译之为用	161
第二节 林译中的文章元素	167

第三节 文体的再现与契合·····	185
第六章 林译评价标准刍议·····	197
第一节 林译评价之论争·····	197
第二节 林译论争之我观·····	221
第三节 笔者评林译：“形神俱备的顺译”·····	233
第七章 林译误译评价·····	239
第一节 误译分析·····	239
第二节 误译评价·····	263
第三节 笔者评误译：“瑕不掩瑜”·····	266
结 语·····	271
附录一 林少华翻译作品·····	281
附录二 孙军悦文《“误译”中的真理 ——〈挪威的森林〉在中国的翻译与接受》·····	287
附录三 采访录·····	311
附录四 林少华翻译手稿·····	320
附录五 文学创作及译文《舞！舞！舞！》 前 24 章中的四字格及叠音词·····	324
附录六 出版社对译稿（部分）·····	349
参考文献·····	351
后 记·····	365

绪 论

第一节 继承中国传统翻译理论

语言是人类沟通思想、交流文化的工具。综观整个人类历史,语言的翻译几乎同语言本身一样古老。无论是在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内,还是在众多的国家或民族间,只要语言文字不同,都离不开翻译。翻译的历史,从人类使用不同语言进行交流的那一天就开始了。

中国是个古老的多民族国家,具有悠久的翻译历史。季羨林曾言:“无论是从历史的长短来看,还是从翻译作品的数量来看,以及从翻译所产生的影响来看,中国都是世界之‘最’。”^①

据学者考证,早在史前时代,我国不同地区的部落、民族间就开始了交际和融合。华夏民族与异邦间的交往始于夏代,《尚书·虞书·益稷》中有“弼成五服”、“外薄四海”的记述。宋朝根据唐宋以前古籍整理而成的大型工具书《册府元龟》“外臣部·朝贡”中也有“夏后即位七年,于夷来宾”、“少康即位三年,方夷来宾”之类的记载。这些“于夷”、“方夷”与夏商王朝并非同族,前来朝贡,语言有殊,必赖于翻译。到了周代,翻译活动有了明确记载。在《周礼》和《礼记》两部古书里,专门介绍了周王朝的翻译官:

《周礼·秋官》:“象胥,每翟上士一人,中士二人,下士八人,徒二十人。”^②“象胥,掌蛮、夷、闽、貉、戎、狄之国使,掌传王之言而喻说焉,以和亲之。若以时入宾,则协其礼,与其

^① 季羨林. 季羨林谈翻译[M]. 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7: 8.

^② 郑玄注,贾公彦疏,彭林整理. 周礼注疏(下)[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1315.

辞，言传之。”^①

《礼记·王制》：“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②

在《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中，亦有关于周王朝翻译活动的记载：

交趾之南有越裳国。周公居摄六年，制礼作乐，天下和平。越裳以三象重译而献白雉，曰：‘道路悠远，山川沮深，音使不通，故重译而朝。’^③

这段文字可视为我国乃至世界上最早的口译记录。越裳国来使需通过三位“象胥”，三道翻译手续，方能与周公进行交流。若以周成王（前1042年—前1021年）的“周公居摄六年”推算，此译事发生在公元前1037年左右。这说明我国至少在公元前11世纪，就有了通过多重翻译进行交流的史实。

笔者不厌其烦地引述古籍，是想证明中国翻译历史之悠久，翻译实践之丰富。众所周知，理论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其生命力深深根植于实践之中。人类任何社会实践活动发展到一定阶段后，都将随之产生与之相适应的理论，而理论又反过来指导实践。翻译亦不例外。在翻译实践的基础上，我国古代哲人逐步形成了对翻译的理解和认识，这些个人的、总结性的见解是传统翻译理论的基本形态，它们最终汇聚成了中国传统翻译理论（以下简称“中国传统译论”）。

我国翻译理论的发展，基本上与翻译史相对应。笔者在现有研究成果基础上，结合自己观点，对我国翻译理论的发展脉络做一梳理。

王宏印将中国传统译论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肇始阶段、古典

① 郑玄注，贾公彦疏，彭林整理。《周礼注疏（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1490。

② 俞仁良译注。《礼记通译》[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108。

③ 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1：2278。

阶段、玄思阶段、直觉阶段。”^①如果按照中国文化的社会历史分期，又可分为古代部分、近现代部分、当代部分。其中，古代部分对应肇始阶段，近现代部分对应古典阶段和玄思阶段，当代部分对应直觉阶段。

在考察王宏印“四分法”后，笔者认为春秋战国至西汉这一阶段，应该出现了中国传统译论的萌芽。春秋战国时期，各国语言文字不尽相同，然而这一时期“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其中必少不了翻译的功劳。

在《春秋穀梁传》一书中，记载了孔子对翻译问题的看法，“桓公二年，夏，四月，取郕大鼎于宋，戊申，纳于太庙。桓内弑其君，外成人之乱，受略而退，以事其祖，非礼也。其道以周公为弗受也。郕鼎者，郕之所为也。曰宋，取之宋也，以是为讨之鼎也。孔子曰：名从主人，物从中国，故曰‘郕大鼎’也。”^②

“名从主人，物从中国”作为翻译原则，在《春秋穀梁传》另有三次应用：“襄公五年，夏，郑伯使公子发来聘。叔孙豹、缙世子巫如晋。外不言如，而言如，为我事往也。仲孙蔑、卫孙林父会吴于善稻。吴谓善伊，谓稻缓。号从中国，名从主人。”^③“昭公元年，晋荀吴帅师败狄于大原。《传》曰：中国曰大原，夷狄曰大鹵。号从中国，名从主人。”^④“昭公五年，秋，七月，公至自晋。戊辰，叔弓帅师败莒师于赿泉。狄人谓赿泉失台。号从中国，名从主人。”^⑤

“名从主人”主张尊重原始名称，事物以主人所称之名为名，“物从中国”或“号从中国”主张以“中国”地区的说法为准。“两者结合，构成了最早的专有名词翻译的完整原则。”^⑥这一原则本身，以及由“名从主人，物从中国”到“号从中国，名从主人”的转变，隐含着儒家在处理译名问题时以中国为主的思想——“中国以自己的道德文化和

① 王宏印. 中国传统译论经典诠释——从道安到傅雷[M].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221.

② 承载撰. 春秋穀梁传译注[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57.

③ 同上，第514—515页.

④ 同上，第602页.

⑤ 同上，第612—613页.

⑥ 赵巍. 中国传统译论中的“意识形态”[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1，（3）：70.

衣冠文化、礼仪文化优于外族,华夏是各民族的中心,在民族交往中应处于主体地位。”^①西汉时期,董仲舒“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从此,这种大国文化心态被“发扬光大”,影响深远。中国历史上的几次翻译高潮都注意同中国固有文化传统相协调,最后以吸收融合而告终就是最好例证。直至近代,在讨论译名音译时,梁启超、周作人等人依然把“名从主人”作为一条总的准则,可见孔子这一思想的强大生命力。赵巍认为:“自觉的归化是大国文化意识在翻译实践中的表现,……在现今多元文化的现代世界,文化观念上的纠葛仍然没有完全解决,意见远未取得统一。但文化乃至政治上的大一统仍然是中国主流意识形态之一,仍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翻译的理论与实践。”^②其实,孔子思想对传统译论的影响并非局限在“名从主人,物从中国”这八个字上,更多地体现在其他方面。可以说,中国传统译论在其萌芽阶段就定下了一个基调,并一直影响至今。

始于东汉止于宋朝的佛经翻译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翻译高潮。这一时期,“以佛经翻译实践为依托,以译经序言为主要形态”^③,形成了关于佛经翻译的初步的理论探讨,被称为中国传统译论发展的“肇始阶段”。其中最重要的译论包括:支谦的《法句经序》,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鸠摩罗什的“西方辞体”论,慧远的“厥中”论,彦琮的“八备”说,玄奘的“五不翻”以及赞宁的“六例”等。通过研究,可以发现这些理论虽然语焉不详,但基本涵盖了翻译的方方面面,涉及到了本体论、主体论、文本论、方法论等诸多问题。而且,从一开始这些译论就深深地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土壤之中,与我国传统文论息息相通,为我国传统译论的发展划定了方向。

晚清时期,面对西方各色思想文化潮流的涌入,中国一部分先进知识分子为了救国保种,开始了向西方寻求真理的艰辛征程。在这样一个双向流动的历史进程中,翻译活动日益频繁,翻译理论的探索也带有显著的时代特征,这一阶段被称为中国传统译论发展的“古典阶

① 赵巍. 中国传统译论中的“意识形态”[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1, (3): 70.

② 同上, 第89页。

③ 王宏印. 中国传统译论经典诠释——从道安到傅雷[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3:

段”。该阶段“以借鉴中国传统修辞写作理论和西方语言学理论为主体，试图找到和建立中国译论的基本思路”^①。这一阶段虽然“理论化和操作化倾向均较前为甚，有制订翻译规则之企图”^②，可仍是对前阶段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其中最重要的理论是严复基于传统写作理论的“信、达、雅”三字诀。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中写到：“《易》曰：‘修辞立诚。’子曰：‘辞达而已。’又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三者乃文章正轨，亦即为译事楷模。”^③“信达雅”作为“译事楷模”的同时亦是“文章正轨”。由此可见，严复确实是用传统文论来论述翻译，把翻译当作“文章”来经营的，尤其是“三者乃文章正轨，亦即为译事楷模”，明确宣示了翻译是要做“传世之文”。

到了民国时期，文坛和译坛明星辈出，这是我国译论取得较大进步的时代。最突出的特征是“以借鉴哲学原理介入翻译理论的研究，或者把翻译问题哲学化，以求解决翻译是否可能的问题，企图建立翻译的哲学基础。”^④这一阶段因此也被称为中国传统译论发展的“玄思阶段”。其中最重要的理论包括胡以鲁、容挺公、章士钊和朱自清关于译名“音译”和“义译”问题的论争，贺麟关于翻译可能性的论证和金岳霖论“译意”与“译味”。他们主要围绕翻译是否可能或可译性问题进行哲学化思辨，论题并没有超出传统文论范畴。例如：贺麟曾针对“言意之辨”的传统思维模式进行反驳，他认为：“言虽不能尽意，言却可以表意。文虽不能尽道，文却可以载道。盖言为心之声，亦即言为意之形。……意与言或道与文是体与用、一与多的关系。言所以宣意，文所以载道。意与言，道与文间是一种体用合一，而不可分的关系。故意之真妄，道之深浅，皆可于表达此意与道的语言文字中验之。”^⑤

① 王宏印. 中国传统译论经典诠释——从道安到傅雷[M].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221.

② 同上.

③ 严复. 《天演论》译例言，罗新璋、陈应年编. 翻译论集（修订本）[C].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202.

④ 王宏印. 中国传统译论经典诠释——从道安到傅雷[M].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221.

⑤ 贺麟. 论翻译，罗新璋、陈应年编. 翻译论集（修订本）[C].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518.

传统译论发展到当代,显著特征是译论与国学密切结合,不仅从传统文论入手论翻译,更从国学各方面论述翻译。王宏印称这一阶段为“直觉阶段”,认为“(该阶段)以回归中国传统文艺学的直觉思维方法为理论源泉和思辨特征,尤其注重借鉴语源学资料 and 关注语言问题,名义上试图融合东西之学,实际上乃是回归国学的根本”^①。笔者认为“回归”二字或许不恰当,传统译论的发展一脉相承,一直以来并未跳出国学范畴,只是这一阶段在论及意境、形神、风格等问题时,将国学的“诗论”、“画论”、“书论”等移植到翻译理论构建中,其核心仍是围绕翻译转换问题,把标准和方法融为一体,且侧重于文学翻译本质的讨论。该阶段最重要的理论包括:钱钟书的“化境”说和傅雷的“神似”说。以傅雷的“神似”说为例,傅雷早年曾在巴黎大学专攻艺术理论,在绘画艺术方面颇有造诣。当他作为翻译家论及翻译时,以“画论”述翻译,提出“重神似不重形似”的观点。在《高老头》“重译本序”中,傅雷写到:“以效果而论,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②

以上结合中国翻译史,简要回顾了中国传统译论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中国传统译论源于翻译实践,根植于传统文化,与国学息息相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值得我们引以为豪并继续发展的。

然而,当“西学东渐”的浪潮撬开中国古老的大门,中学与西学构成了一对矛盾,中西两种话语体系展开竞争,结果却以中国学术话语的失败而告一段落。如曹顺庆所言:“整个20世纪中国的人文学科研究实际上都患上了‘失语症’,全盘套用西方的话语系统,没有自己的理论话语,大部分中国人文学科研究都削足适履地成了西方话语系统的注脚。”^③

翻译亦是如此。庞秀成指出:“翻译理论中,中国传统学术话语

① 王宏印. 中国传统译论经典诠释——从道安到傅雷[M].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 221.

② 傅雷. 《高老头》重译本序,傅敏编. 傅雷谈翻译[M]. 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6: 3.

③ 曹顺庆等. 中国古代文论话语[M]. 成都:巴蜀书社,2001:序言第1页.

被形式/内容这对根源于西方的术语替代、简化、收编。虽然用这对术语能够帮助理解原有概念,揭示翻译中一些未曾理解的侧面,但在文化重建和现代化的旗帜下滥用也会造成中国本土概念的遮蔽、扭曲甚至退化。”^①吴志杰指出:“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引进了大量的西方翻译理论,其中包括雅各布逊、费道罗夫、巴尔胡达罗夫、奈达、卡特福特……等一大批学者的译学论著,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西方译论的消费者。在这段时期里,虽偶尔有零星的不乏真知灼见的文章从中国传统的言路论及翻译,但中国传统译论研究在整体上一直处于边缘化的状态。”^②

在“一边倒”的失语状态下,“这种整体上的‘萧条’状况因罗新璋等学者的努力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有了些许改变”^③,中国传统译论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198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罗新璋选编的《翻译论集》,该书收集了汉末以来有关翻译的文论一百八十余篇,序言《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整理出我国传统译论“案本——求信——神似——化境”的发展脉络,影响深远。该书于2009年出版修订本,订正了一些错误,篇目上略作增删,是研究传统译论极为宝贵的资料。与罗新璋编《翻译论集》同一时期的,还有1981年香港三联书店出版的刘靖之主编的《翻译论集》、1984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的《翻译通讯》编辑部主编的《翻译研究论文集》(1894—1948; 1949—1983)两卷本。刘氏主编的《翻译论集》收录严复以来的翻译论文三十余篇,其选文标准体现了明显的传统译论取向。《翻译研究论文集》两卷本收录的论文同样具有显著的传统译论特色,对研究传统译论具有重要价值。

进入九十年代以来,我国传统译论的研究相比前一阶段有了进一步发展。影响较大的论文集有杨自俭、刘学云主编的《翻译新论》(1994年)、张柏然、许钧主编的《译学论集》(1997年)和《面向21世纪的译学研究》(2002年),这三本论文集较为全面地反映了这一时期我

① 庞秀成. 译论以形式/内容收编中国学术话语的反思[J]. 中国翻译, 2011, (3): 5.

② 吴志杰. 中国传统译论专题研究[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9: 4.

③ 同上。

国传统译论的研究情况。

这一时期还出版了与中国翻译相关的系列专题研究：陈福康著《中国译学理论史稿》（1992年）、《中国译学史》（2010年），后者在前者基础上校订而成，内容基本相同。全书记述并评说了历代有代表性或有重大影响和意义的译论家和译学流派的观点，勾勒出了中国译学的轮廓，梳理出了中国译学流变的线索。马祖毅著《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1984年版、1998年增订再版），史料非常丰富，记述了我国自远古到“五四”运动前的翻译活动，对我国历史上出现的三次翻译高潮（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鸦片战争后至“五四”前的政治思想与文学翻译）作了重点评述，并评介了各个时期的重要译家及其译作、译论与译法，以及有关的翻译组织和规章制度等。王秉钦、王颀著《20世纪中国翻译思想史》（2004年版、2009年修订再版）分上、下两篇。上篇为“传统篇”，论述中国传统翻译思想的形成、转折、发展和鼎盛；下篇为“现代篇”，重点论述中西翻译思想的融合、翻译学科全面建设和当代中国翻译思想的调整。在论述中，作者更多关注新时期的新译论、新观念、新思想，以及当代中国翻译思想的发展路径和走向。朱志瑜、朱晓农著《中国佛籍译论选辑评注》（2006年）一书既有僧人学者对佛经翻译的看法论述，也有针对一些著名翻译家的评论，作者以现代观点来透视佛经翻译理论，从历史角度提出各家论点之间的联系，为佛经翻译理论的系统化做出了有益尝试。这几本著作史料详尽，体系完备，见解独到，为本书研究中国传统译论提供了论据材料，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作用。

这一时期专门研究传统译论，最重要的成果当属三部专著的出版：王宏印著《中国传统译论经典诠释——从道安到傅雷》（2003年），全书按时间顺序分为四编（上编古代部分〈148—1840〉、中编近现代部分〈1840—1949〉、下编当代部分〈1949—2000〉、余编新译学探索〈2000—2003〉），每一编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等不同角度重点评述了历史上经典的传统译论，从而让传统译论的经典得到了充分的诠释，为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译论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张思洁著《中国传统译论范畴及其体系》（2006年）一书考察了传统译论范畴及其

源流，并划定了传统译论的本体论范畴、认识论范畴、审美过程论范畴，最后得出结论：传统译论的现代转型问题事实上可以归结为传统译论赖以孕育的中国传统的基本价值观在时代的要求之下如何调整与转化的问题，也即是说，传统译论的现代建设必须立足于传统译论赖以孕育的传统学术思想的深厚基础之上。吴志杰著《中国传统译论专题研究》（2009年）从翻译的本体论视角、伦理学视角、认识论视角、美学攻略、文化生态学视角，构筑了中国传统译论的理论体系，解释了相关的翻译思想，解决了现存的翻译问题，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和重要的理论价值。这三部著作对本书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借鉴。还有一些专门研究中国传统译论的重要文献资料，在此不作一一叙述。

此外，还有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比研究中西译论，如谭载喜发表了《中西译论的相似性》（1999年）、《中西译论的相异性》（2000年）等文章；刘宓庆的专著《中西翻译思想比较研究》（2005年）探讨了中西翻译理论的思想渊源和流变；曹明伦的专著《翻译之道：理论与实践》（2007年）回顾了中西翻译理论与实践关系的历史，并在此基础上对中西翻译现状进行了剖析，证明翻译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良性互动从来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道路永远都是翻译活动最理想的道路。还有其他学者的相关文章、著作等，在此不一一列举。

在看到成果的同时，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一边倒”的状态并未得到彻底改变。“已有的此类研究主要集中在从非常有限的中国传统译论资源（尤其是佛经翻译的序、跋、译家传记）中‘淘宝’，大多通过与西方翻译理论进行对照‘阐发’其中的意义，……在方法上，现有的研究多数把中国的译论置于西方翻译理论的标准中进行定位，这容易导致对中国传统译论的‘误读’与‘贬低’，无法彰显出中国传统译论的魅力。”^①这种状态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中国翻译的发展，不利于中国翻译理论的研究和构建。

张柏然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向学界呼吁：“中国译论要有中国

① 吴志杰. 中国传统译论专题研究[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12.

味。”^①陈福康向学界建议：“我国的翻译理论需要更新与提高，但只能是在传统的基础上更新，在原有的起点上提高。而且，语言文字是最带有民族特性的东西，各国的翻译理论都深深根植于本国的历史结构和特定文化土壤之中，中国的译学理论自然也带有中国的民族特色。我们不能割断历史的脉络，我们也不可能抹去民族的烙印。我们需要横向的引进，更需要纵向的继承。”^②

辜正坤建言：“国人采撷西人译论，宜乎别具只眼，未可囫囵吞枣，简单比附”因为“彼外邦言说，固不缺精粹独到之理，其构架往往具恢宏气势，条分缕析，辞富而意明。然文以载道，道以文传。文异难免所传之道趋异；道异难免所籍之文难工。西人论述所凭之媒介，多属印欧语系文字，与表意汉字扞（注：原文如此，应为“扞”）格难通。以汉字论，其会意、形声，暗追造化；象形、指事，妙合自然。故汉字本身，观如图写万物，摹象状事，宛若再现。而印欧语系文字，曲卷类蚯蚓或蝌蚪状，象形之际荡然无存。其所长者，在乎语法精密、系统，书写简易、经济。语义定位，清晰明白。虽不与造化同脐，却常显通人私智。故中西两类文字各有所长、各有所失、各有所依、各有所蔽。文字如此，其所分头揭载之意象、义理，又何独不然？倘顾及中西哲学、伦理、审美、风俗诸种文化背景与差别，则中西理论之不可机械等类观之、用之、扬之、抑之，实昭然若烛照三更暗室。”^③

潘文国呼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翻译学”，“从哲学研究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出发，对译学研究的一些现象问题进行追根溯源的探索和思考。本体论探讨的是：翻译学是‘学’还是‘术’？结论是，翻译学应该‘学’‘术’并重。认识论讨论的是，翻译学研究的问题从哪里来？怎样避免‘伪命题’？结论是，问题必须从自身的实践中来，要正确对待移植过来的问题。方法论讨论的是，有没有‘中国特色的翻译学’？结论是，从各方面的条件看，‘中国特色’翻译要想不建立

① 张柏然、许钧编。《翻译论集》[C]。南京：译林出版社，1997：序言第1页。

② 陈福康。《中国译学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引言第2页。

③ 辜正坤。《译苑新葩又一春——序曹明伦著《翻译之道》》，曹明伦。《翻译之道：理论与实践》[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7：序言第2页。

也难。”^①

由此看来,在翻译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蓬勃发展的今天,继承和发扬我国传统译论已刻不容缓。在继承的同时还须清醒地认识到,传统译论产生的文化语境与当代不同,翻译对象、翻译研究对象也与当代有所不同,我们应继承其中具有现代意义的“养分”。继承的目的在于借鉴,在于创新,在于应用,将传统译论运用到翻译研究与实践中去,这样才更具实际意义和价值。笔者即想做一尝试,通过观照中国传统译论来研究林少华文学翻译。

第二节 林少华文学翻译研究价值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翻译出版的日本文学作品数量众多,可人们很少将目光投向这些把日本文学呈现在国人面前的“幕后英雄”,林少华算是一个例外。

林少华自1984年翻译日本电视连续剧《命运》登上中国译坛,至今已30个春秋,翻译并出版了90余部作品(含合译本,详见附录一),其中包括剧本、小说、随笔、纪实文学、儿童文学等多种文学体裁。翻译所涉及的日本作家有水上勉、舟桥圣一、狮子文六、井上靖、永井荷风、松本清张、吉本芭娜娜、东山魁夷、林真理子、江户川乱步、川端康成、原田康子、谷崎润一郎、村上春树、片山恭一、三岛由纪夫、芥川龙之介、夏目漱石、那须正干、小林多喜二、岩村和朗等等。他的译文自然流畅、优美清丽、简洁明快、韵味绵长,深受广大读者的认可和喜爱。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林少华独家翻译了41部村上作品,被誉为“林家铺子的掌柜”。可以说,是林少华将村上文学带到中国大陆读者面前,并形成了“村上春树现象”乃至“村上春树文化”。王志松为我们描述了当时的景象:“一时间村上春树成为文学阅读的热门人物。人们阅读、讨论、关心着有关村上春树的话题。网上有很多相关文章和

^① 潘文国. 译学研究的哲学思考[J]. 中国外语, 2009, (5): 98.

链接,出现专门的网站让喜爱村上春树的读者交流阅读体会,讨论与村上春树有关的各种话题。进而又有人将这些网上文章编辑起来用纸媒介出版,也有人趁机编辑出版各种与村上春树有关的书籍,如小说中出现的菜谱、音乐等等。是否阅读过村上作品甚至成为‘小资’的认证资格,远远超出了文学范围,而成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了。”^①

在王向远著的《二十世纪中国的日本翻译文学史》(2001年)、《日本文学汉译史》(2007年),孟昭毅、李载道主编的《中国翻译文学史》(2005年),以及杨义主编、赵稀方著的《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新时期卷)》(2009年),都开辟独立章节评述林少华对日本文学作品,尤其是对村上春树作品的译介,这足以说明林译在中国翻译文学史上占有了一席之地。

正是基于林少华在文学翻译上的突出成就,林译所带来的巨大而广泛的社会效应,以及林译在中国翻译文学史上的地位,使得林少华的文学翻译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值得笔者对其进行系统深入的分析研究。只有对译者林少华、林少华的翻译理念、翻译标准、翻译方法、翻译目的、翻译文本、翻译文体等进行全方位探讨,方能发掘出林译特色、林译成功的关键所在,这是笔者研究的出发点和所要达到的主要目标。

人们在品读林译文学的同时,也开始关注和研究译者林少华及其译文本身。据笔者掌握的资料,国内对林译的研究始于穆雷,在其著作《通天塔的建设者——当代中国中青年翻译家研究》(1997年)中,她对林少华精彩的译序和优美的译笔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对林少华在日本古典诗歌研究、中日古典诗歌比较研究方面的成就给予了褒扬。早期对林译做出肯定评价的还有陆新之(《属于这一代的村上春树》,1999年),王向远(《二十世纪中国的日本翻译文学史》,2001年),叶岗(《迷失自我的象征性森林——〈挪威的森林〉赏析》,2002年)等等,他们都认为林译文字优美,文体独特,准确到位地再现了原文风格。美中不足的是,在这些评述中未见实证分析,也未将林译实践与

^① 王志松. 消费社会转型中的“村上现象”[J]. 读书, 2006, (11): 67.